

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

周 金 华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一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中挣脱出来,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关键词: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个性解放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成果——诸子百家的著作,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道路。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社会的几种主要的思想体系几乎都在那个时期形成了雏形或具备了基本体系。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瞩目,不少精密深邃的论点,即使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失去光彩,许多毫无实证基础的推断竟然与现代科学的实验结果完全符合。”^①许多学者在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取得如此辉煌瞩目的成就的原因时,往往相对简单地归结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这诚然不错,但我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与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这种解放是空前的,它不单单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中挣脱出来,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②,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心灵和个性的解放。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使他们从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人身依附的摆脱与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知识也如同物质财富一样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在我国奴隶制时代,实行的是“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只有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才有享受教育的权力与资格。因而,最初的所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正如老一辈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所说:“任何国家知识分子之所在,最初必完全在统治阶级里。”^③在周代,宗法制、分封制和礼刑制度构成了奴隶制等级统治的核心。宗法制以血缘关系来确立和维系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比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④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则从权力与财产上来区分和巩固这一等级统治,而礼刑制度则从道德和法律上予以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编织起来的巨大社会网络中,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被牢牢网住,带有明显的人身隶属和依附关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虽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却隶属和依附于上层贵族并为上层贵族服务。西周中后期以来,奴隶制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以及周边部落不断进攻的三重打击下,日趋瓦解。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周天子王权

旁落,代之而起的是诸侯崛起,大夫力政。原来由分封、宗法制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等级统治结构不断解体,维系这一等级统治结构的一套礼乐制度也随之全面崩溃,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大夫叔向对齐国的晏婴诉说晋国奴隶主贵族的破落情况,叔向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官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滋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蹈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免,岂其获祀?叔向所说的,正是春秋中后期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政在家门”,一批新兴贵族逐步控制了政权,如晋之六卿、齐之田氏、鲁之三桓,他们取代了旧贵族的统治。一大批旧贵族的腐朽没落连同服务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被抛弃于统治体制之外,沦为自食其力的平民。另一方面“民无所依”,旧秩序的解体使广大奴隶、平民摆脱了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被抛弃于统治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或不谙于实际生产劳动,或不屑于实际生产劳动。如孔子对学生樊迟问稼嗤之以鼻说:“小人哉,樊须也!”^⑤他们不得不以知识和技艺为生,有的投奔新贵族,有的开始在家收徒授业,因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批下层平民摆脱了生计的困扰,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上升为上层社会一员的向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赵襄子因任用了平民出身的中牟、胥己为官,“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也反映出当时下层富裕平民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上升为上层社会的向往的强烈心态。《吕氏春秋·博志》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情况:“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其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伴随奴隶制的解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奴隶制时

代的教育体系也全面瘫痪,私学开始兴起,“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了。早在孔子之前,已有不少私学存在^⑥,至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私学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大大加快。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私学达于鼎盛。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⑦墨子有弟子数百人。孟子游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⑧。田骈在齐,“资金千钟,徒百人”^⑨。宋尹文“聚其群徒,辩其谈说”。^⑩“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摆脱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传统,……标志着中国古代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⑪随着私学得到飞速发展,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无论是身份还是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了。一方面,无论来自沦落的贵族还是来自平民阶层,他们都已摆脱了宗法制下的人身依附和地域限制,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流动,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或游宦求仕,朝秦暮楚;或聚徒讲学,辩其谈说;或渔樵耕织,隐而不见。如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⑫另一方面,礼乐制度的崩坏,使他们解除了奴隶制沉重的精神枷锁,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思考,大胆求索。或放眼现实,针砭时弊;或探索自然,找寻奥密;或纵论古今,构想未来。总之,他们显得更自由活泼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更具主体意识和创新活力。正是这样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自觉担当起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的历史使命。

二、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发展史上看,人类理性自觉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普遍经历了一个由神到人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在对传统天命神权观念的批判中完成的。在我国,自夏商以来,天命神权观念成为维系奴隶制等级统治的至上法宝,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有夏服天命”^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⑭，统治阶级自觉

或不自觉地把天帝鬼神塑造成具有意志的万能的神灵,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人只不过是天或神的附属物,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人只能“恪谨天命”,不可违抗。商代统治者,事无大小,都要占卜,把敬天事神看作是国家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表现出对天神的极度迷信和盲从。在这里,人性被神性所替代,人的价值被神的价值所掩盖。周代统治者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重构了“敬天”、“明德”、“保民”为思想内容的新型天命神权理论。与商代统治者“先鬼而后礼”的重鬼神、轻人事的神权观念不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⑤,周代统治者在敬天命的同时,强调了尽人事的思想。他们“把天神和祖宗神的形象赋予某种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塑造成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为宗法奴隶制服务”,这一“宗教思想,可以说是从原始的宗教蒙昧主义中冲破了一道缺口,为开展自觉的理性认识活动争得了一席之地”。^⑥尽管如此,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还是淹没在宗法神权观念之中。西周中后期以来,由于上层统治者的腐朽和贪婪,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一大批奴隶主贵族被消灭或破落。这些破落贵族(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一方面对现实表现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开始对天命神权观念产生怀疑并进行认真反思。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怨天、恨天乃至否定天的思潮,“旻天疾威,天降笃丧,殄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⑦,“昊天不弔,降此大鞠,昊天不惠,降此大戾”^⑧,人们把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归罪于天,并向上天发出了严厉的责问。特别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反映出来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的思想,已经把思维的视觉从对上天怀疑转移到对现实统治者的批判上来了。这不仅是对天命神权理论的极大挑战,而且多少显露出人类理性的光芒,反映出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卡尔·曼海姆指出:“一般说来,怀疑主义产生于以群体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崩溃。对于一个世界观的确信有赖于其支持者的安全感,当个体在群体中的立足点开始变得不安全或这一群体的团结开始瓦解时,个体就开始怀疑该群体的既定的信念。”^⑨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提高了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凸显了人的价值和作用,也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同时现实斗争中,知识分子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了腐朽统治者的贪残暴虐与其所宣扬的“敬天”、“明德”、“保民”的天命神权理论的严重乖离;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了下层民众在改造自然和反抗压迫斗争中的力量。这不仅进一步暴露了天命神权理论的虚妄,而且进一步唤起和促进了知识分子理性意识的觉醒。如果不揭开天命神权的神秘面纱,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将依然被严重窒息,现实生活中腐朽的统治阶级将假借它继续作威作福。在经过理性的思索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向传统的天命神权理论发起一步步的冲击。《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在这里,季梁一方面指斥了统治者迷信天命鬼神、不修民事的愚蠢行为,另一方面把民从传统神人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提升到主动地位,凸显了民的价值和作用,为社会上人们正确认识神人关系打开了缺口。接下来虢国大夫史墨又从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的观点^⑩,进一步突出了民在国家兴亡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把神降到了人的意志的执行者的位置,从而否定了传统天命神权观念中神的主宰地位。公元前524年,郑国的裨灶劝告执政大夫子产祭天以消除火灾,子产回答:“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⑪在这里,子产第一次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这不仅是对传统天命神权观念的致命一击,也是中国认识史上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为后来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鲁大旱,僖公欲焚巫尪以防旱,大夫臧文仲指出:“非备旱也。修城廓,贬食省用,务稼劝分,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臧文仲不仅对僖公不修民事而迷信鬼神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且从对神意的表达者——巫的作用的否定进而否定了天有意志的传统观念。春秋末年,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⑫把“天”看

成为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自然之天了。到战国时期，荀子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②，从而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传统天命论。在把“天”还原给自然，把人还原给社会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③荀子在否定天命的同时，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这充分反映出战国时期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天命神权理论的批判，摧毁了天命神权理论体系，无情地撕毁了天命神权的神秘面纱，使人们发现了现实世界。它不仅解除了长期套在人们心灵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个性的张扬与人文精神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现实的太阳旋转。”^④在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和解除精神枷锁之后，知识分子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首先是重塑知识分子自我的形象，张扬知识分子个性特征。儒家创始人孔子率先提出了知识分子总体形象设计和要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⑤在《论语》中，孔子从理想、道德、学习、个性修养、为人处世等方面，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形象设计目标和自我实现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也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塑造这一形象，总括其主要有如下几点：1. 具有远大理想和人生抱负。“士志于道”，知识分子自觉把追求理性、正义——“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和人生奋斗的最高价值目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⑥“先秦诸子，无论思想怎样不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⑦他们把“道”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价值本源，为了“道”，他们“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⑨；为了“道”，他们可以放弃物质享受，“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⑩；墨家“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跣为服，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⑪为了“道”，他们甚至可以放弃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⑫，“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⑬《墨子·公输》记载墨子为阻止楚国攻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面对公输班和楚王的以死相挟，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最后折服了楚王，使它取消了攻宋计划。2. 高扬自由的价值与人格尊严。刚刚从奴隶制桎梏中摆脱出来的知识分子，格外珍重自由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孔子提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⑮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⑯。荀子提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轻物矣。”^⑰他们特别强调主体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他们宁愿舍弃富贵，隐而不仕，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断然回绝，他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再仰仗统治阶级的鼻息，而是高举道义的大旗，抗礼王侯，傲视权贵。3. 积极进取，锐意创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⑱身心的解放，焕发了知识分子的青春活力，他们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理性自觉投身于现实的变革之中。他们或仰视苍穹，探求宇宙奥秘；或追问历史，构想未来；或着眼现实，思索人生。充分展示出知识分子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时代精神。4. 谦虚好学、举止文明。思想禁区的突破，展现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认知天地，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太多的新事物需要认知，他们迫不及待需要得到问题的答案。于是“敏而好学，不耻

下问。”^⑩“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⑪就成了他们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他们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也继承了前代知识分子的“谦恭礼让”的优良传统。孔子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⑫。行为举止是知识分子学识和德性修养的外在反映，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重塑，不仅赢得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各诸侯国统治者纷纷“礼贤下士”，甚至养士成风，为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提供了重要的角色位置，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典范。

其次是高度的人文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⑬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斗争异常激烈，造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刺激了新旧统治阶级腐朽贪婪的欲望，他们加紧了对人民的疯狂掠夺，激起了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新旧贵族内部争权夺地，互相残杀，给各诸侯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特别是残酷的争霸兼并战争，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繁重的赋役，而且使大量的精壮劳动力被迫从军，惨死战场。孟子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⑭有人统计，《春秋》二百多年中，大小战争四百八十余次，战国时期的战争更多得无法统计。到处是哀鸿遍野，白骨如山，整个社会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面对社会秩序的失范，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战乱频仍，刚刚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在理性和良知的强烈驱使之下，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担当起拯救天下苍生、重建理想家园的历史重任。一方面，他们高举起道义的大旗，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为唤醒社会良知，恢复社会秩序，重建理想家园而“上下求索”，探求良方，绘制蓝图，并以满腔热情为之奔走呼号。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揭露当时“天下无道”、“苛政猛于虎”，愤怒指斥鲁国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⑮提出了“克

己复礼”和“仁”的学说，并不辞辛劳，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也有有力地揭露出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的丑恶嘴脸^⑯，提出“王道”、“仁政”学说，并为之奔走呼号。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猛烈抨击统治阶级的贪婪无耻，指出：“民之饥，以其上税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⑰提出了“绝圣弃智”和“小国寡民”的理想蓝图。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深刻揭露出统治阶级“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贪婪面目^⑱，认为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争夺是造成社会黑暗的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一整套救世方案，并身体力行，前面提到他为阻止楚国攻宋之事，即其一例。他的弟子们也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⑲，实践着墨家的救世主张。虽然各家学派的方案不一，但他们的旨意却是高度的一致，那就是要唤醒社会良知，恢复社会安定，重建理想家园。他们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情怀，充分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自觉意识和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为后世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中国历史上每当国难当头时候，知识分子总是率先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自觉意识和救世精神，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注：

①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② 张岱年：《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当代学者自选集：《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③ 《中国社会史论》：上册，齐鲁书社，1988年，第206页。

④ ②②《左传》，“桓公二年”、“昭公十八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册第94页；第一册252页；第四册第1359页。

⑤ ②③②③③③③④④④《论语》，“子路”、“阳货”、“述而”、“泰伯”、“泰伯”、“卫灵公”、“卫灵公”、“泰

- 伯”、“子罕”、“公冶长”、“雍也”、“八佾”,《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
- ⑥《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79页。
- ⑦《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 ⑧③④⑤⑥⑦⑧《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滕文公下”、“离娄上”、“梁惠王”、“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⑨《战国策·齐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0页。
- ⑩②③④⑤⑥⑦《荀子》,“正论”、“天论”、“天论”、“修身”、“劝学”,《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389、345、358、20、1页。
- ⑪《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80页。
- ⑫《汉书》: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⑬《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
- ⑭⑮《礼记·表记》,《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640、1640页。
- ⑯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 ⑰⑱《诗经》“大雅·召旻”、“小雅·节南山”,《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579、441页。
- ⑲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453页。
- ㉑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35页。
- ㉒《庄子·天下》,《庄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0页。
- ㉓《周易·乾·象》,《周易集解》卷一,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第11页。
- ㉔《老子》:第七十五章,《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292页。
- ㉕《墨子·辞过》,《墨子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指导教师 岳庆平教授)
(责任编辑 郑 园)